

基金项目成果 |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Political Reform in Vietnam

陈明凡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Political Reform in Vietnam

陈明凡/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 陈明凡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097 - 3738 - 5

I. ①越… II. ①陈… III. ①政治体制改革 - 研究 -
越南 IV. ①D73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826 号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著 者 / 陈明凡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责任校对 / 张春兰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738 - 5

定 价 / 48.00 元

印 张 / 16.25

字 数 / 24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 论	1
一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共同课题	2
二 中越两党交流改革经验的高层理论研讨机制	3
三 从中越两国的经验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6
四 从中越两国的经验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	8
第一章 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与进程	11
一 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	11
二 越南政治革新的进程	20
第二章 越南政治革新的理论基础	27
一 时代观：确定政治革新方向的罗盘	28
二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指明政治革新的正途	44
三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明确政治革新的价值目标	63
四 社会发展阶段定位理论：制定政治革新政策的基本依据	77
五 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推进政治革新的巨大动力	92
六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理论：贯穿政治革新进程的主线	114
七 工人阶级理论：夯实政治革新的阶级基础	129
八 执政党的建设理论：决定政治革新成败的关键	138
第三章 越南政治革新的基本内容	165
一 把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作为政治革新的关键	165
二 改革和完善国会制度	180

三 以建立高效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	189
四 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的司法改革	204
五 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监督体制改革	210
六 采取切实措施增强民族团结	218
七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路径之比较	227
第四章 越南政治革新的基本经验	234
一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	234
二 坚持党对政治革新的领导，把党的自身体制改革放在首位	235
三 努力创造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	236
四 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政治革新	238
五 调动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39
六 公开承认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240
七 正视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241
八 以正确态度借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242
结 论	246
参考文献	250

导 论

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大地震，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轰然崩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顿时跌入谷底。但是，也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逆境中奋斗，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成就。越南就是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东剧变发生时，中国和越南都已经步入了改革的进程，却没有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历史悲剧，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繁荣发展的新天地。这件事本身意义十分重大，它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像苏东剧变那样的历史悲剧具有不可避免性的论断，说明在改革中存在着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分野。

在过去的 20 年里，各国共产党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在对这种罕见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当时人们研究与探讨的重点是苏东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苏东剧变的根源、性质及教训等。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在继续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同时，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探讨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今印度支那半岛的一颗新星——越南——的迅速崛起，也逐渐进入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研究的视野。如果说，过去有人把中国发展的奇迹看成一个特例，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某些特殊条件造成的，那么今天越南革新的成就，便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越南的发展蕴涵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即进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书聚焦越南政治革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并与中国进行比较，力求从

中总结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共同课题

越南既是与我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有着多方面的历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又同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休戚相关的命运和共同的发展目标。越南的革新事业虽比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略晚，但越南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大致相同，两国都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后逐步对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在许多方面都各有特色。因此，研究越南政治革新的理论与实践，对促进两国交流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与做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像中国、越南这样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的社会改造工程。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政权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建设高于、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优势？如何克服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社会痼疾？如何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先进成果，又防止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发生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这些都是摆在中越两国执政党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和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是因为两国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和越南都是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越南则沦为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造成两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中国和越南的爱国志士为寻找救国之路，都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建立了共产党^①。两国共产党人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

^① 越南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又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恢复原名越南共产党。本书行文中统称越南共产党，历史文献按原文引用。

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胜利后，两国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两国的革命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新中国的成立是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取得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两国都曾不同程度地照搬过“苏联模式”，都经历过严重挫折。中越两党总结历史经验，先后实行了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事业^①，下同），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两国都成功地抵御了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坚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由于两国有相似的国情和奋斗历程，由于历史、文化、地缘等因素，两国人民曾形成“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现在又形成“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友好关系。越南共产党无论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实行全面革新的新时期，都认真学习和吸纳了中国的经验。越南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外国的经验再好，也不能全盘照搬，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在革新的进程中，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主张，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二 中越两党交流改革经验的高层理论研讨机制

自2000年以来，中越两国理论界和两党相继举行了多次高层理论研讨会，交流治党理政和有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每次研讨会都确定一个讨论主题，两党都有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参加。

^① 在越南的文件中，“革新”（đổi mới）和“改革”（cải cách）这两个词都使用，一般说来，在大的领域称“革新”，如经济革新、政治革新等，在具体的领域称“改革”，如国会改革、行政改革等。

中越两国理论界研讨会于2000年6月13~14日在北京举行。两国高层研究人员围绕“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了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①分别做了题为《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若干思考》的主题报告。在此次研讨会上，两国的理论家、学者一起探讨了中越两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此外，还对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独立自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000年11月10~11日，研讨会在河内继续举行，主题是“社会主义：中国和越南的实践”。越方阮德平作了《社会主义革新事业中的越南共产党》的主旨报告，中方李铁映作了题为《21世纪初中国和世界：机遇和挑战》的主旨报告。

前两次讨论会的主要发言收录在李慎明主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于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越两党第一次理论研讨会2003年10月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举措》的主题报告。

中越两党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于2004年2月16日在河内开幕。两国理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越南作者的职务指的是发表讲话、文章、著作时的职务，许多作者今天的职务已经有了改变。

论工作者围绕“执政党的建设——中国的经验，越南的经验”展开了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做了题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和《执政党的建设：越南实践中的若干经验》的主题报告。

中越两党第三次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7月28日在贵阳市举行。两国理论工作者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展开了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分别做了题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科学发展》和《越南二十年革新事业中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主题报告。

中越两党第四次理论研讨会于2008年10月31日在越南芽庄举行。两国理论工作者围绕“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的经验、越南的经验”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出席理论研讨会并致辞，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翟卫华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苏辉若分别代表双方做了主旨发言。

中越两党第五次理论研讨会于2009年12月12日在厦门举行。两国理论工作者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展开了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分别做了题为《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和启示》和《国际金融危机与越南面临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报告。

中越两党第六次理论研讨会于2010年9月7日在越南岬港举行。两国理论工作者围绕“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的主题展开了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教部部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做了主旨报告，分别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探

索和理论、越南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的做法和体会。

中越两党以召开高层理论研讨会的形式不断交流改革和建设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机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三 从中越两国的经验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和越南的改革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在进行，但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丝毫不能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如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对于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政治体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第一，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始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后才有可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也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二，社会主义经过长时期发展逐步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也像其他任何国家政权一样，“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①，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其他旧的国家政权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这种经济必然的自觉的执行者。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个发展进程都是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起着统领的作用。第三，社会主义改革也同样如此。中国和越南的改革都是本国无产阶级政党依据本国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自觉作出的选择。改革的进程也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

中越两国改革的经验说明，首先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改革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性更大。经济体制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5页。

革如果出了偏差，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纠正。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出了偏差，就很危险。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和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都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改革的经验同样证明，当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果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其相适应，长期滞后是不行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② 越南共产党在领导革新事业的进程中，也多次强调政治革新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要把执政党自身体制的革新放在首位。

如何有效遏制腐败，是中越两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反腐败长期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无关联。由于选举机制的不健全，间接选举往往成为对委任制的批准手续。如果在就职干部的心目中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领导，那么他们就会很少考虑人民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满意，而更多地考虑上级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这种潜规则必然成为腐败产生的诱因。权力的集中、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有效遏制腐败除了必须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之外，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便真正形成对干部监督和约束的机制。

目前中越两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64页。

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课题正日益紧迫地提到中越两国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四 从中越两国的经验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

中越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尚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统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当前两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呢？关键在于找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化带动了经济体制各个领域的变革，使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只有实行多党竞选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不搞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算到位。这是把西方民主模式当成衡量民主化的标准，否认民主化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模式。从根本上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搞多党竞选、轮流执政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成立不同的政党来竞选，如果人为地建立非无产阶级政党来竞选，让它上台执政，那就会导致国家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改变，使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的剧烈震荡，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失去赖以顺利进行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和越南如果搞多党竞选，西方敌对势力必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介入和干预，使中国、越南的改革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实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我们绝不能忘记苏联和东欧国家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当前，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如何才能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①毛泽东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看做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新路”，说明了人民监督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路径。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举报制度以来，所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包括大案要案，其线索大都是来自群众的举报。互联网的普及更为民众打开了一条监督政府工作和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行为的重要渠道。又如，越南国会实行质询制度以来，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国会的关切度，国会代表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进行质询的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成为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文章评论说：“国会也从原先的橡皮图章变成了真正开展辩论、进行监督的会场。”^②总之，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断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和健全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在内的人民监督体系，形成自下而上监督和自上而下监督相结合的强大的行之有效的监督网，将权力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只有这样，像遏制腐败那样的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才能不断提高，其公信力也必然会不断增长。

只有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因此，完善人民监督机制必须积极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越南的国会代表已经实行了直接选举，中国目前县以上人大代表实行的是间接选举。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③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时间表，21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8～149页。

② 2007年4月2日《参考消息》。

③ 《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0～221页。

世纪中期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也将变为现实。现在我们必须准备条件，自下而上地逐级推进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上述讲话距今已经 20 多年了，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虽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却进展迟缓。加快向直接选举过渡的步伐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如果到 21 世纪中期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普选仍未提上日程，那就会陷入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现代化进程的窘境。

中越两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都采取积极和慎重的态度，都选择了渐进的方式。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会相对比较小。因此，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作出了一些大胆和有益的尝试。越南的经验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试图通过对越南政治革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通过对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第一章

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与进程

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革新路线。1991年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适应经济革新发展的要求，必须逐步进行政治革新。越南共产党作出政治革新的决策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文化的因素。越南的政治革新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是与经济革新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

一 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世界“民主化浪潮”与苏东剧变的影响和警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对这次“民主化浪潮”作了描述和分析。这次浪潮始于南欧，横扫拉美，波及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到1990年时即已席卷全球30多个国家。需要说明的是，亨廷顿是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民主化进程的。因此，中国、越南这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虽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却被排除在“民主化浪潮”之外，被称为“威权主义国家”，至多是“半民主国家”。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不

是偶然的，时代主题的转换是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大背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是这次“民主化浪潮”的驱动力。

在短短的20年内，数十个国家，特别是其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带有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政治制度过渡到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制度，毕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这一时期，民主化巨浪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地球每一个角落，越南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是，静观其变后人们不难发现，这次“民主化浪潮”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其负面效应也足以令人震惊。拿越南周边的国家来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或频频发生军事政变与内阁更迭，或不断出现民族纠纷和社会骚乱，政治丑闻引发民怨沸腾，群众示威酿成流血惨剧。唯有新加坡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也恰恰是新加坡拒绝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特的政治体制。新加坡的领导力量——人民行动党依靠治国方略的正确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了长期执政。人民行动党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某些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政府的权威和廉政建设，限制反对党的活动，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权对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新加坡的成就令人羡慕，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令人深思。

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说明：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民主政治的模式是多样的，西方政治模式并不是实现民主化的唯一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是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对越南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影响更大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变局。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与越南毗邻的中国也都进行了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进程中却逐渐地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举出了两面标志不同改革道路的旗帜：一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另一面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